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幻想党论文

Tiqqun

Tiqqun
幻想党论文
1999 年

zh.anarchistlibraries.net

1999 年

”思想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只出现在那些罕见的历史时刻，在这些时刻，”事情分崩离析；中心无法维持；纯粹的无政府状态被释放在世界上”；在这些时刻，”最好的人缺乏所有的信念，而最坏的人/充满了激情”。在这些关键时刻，思想不再是政治问题的边缘事务。当整个世界不假思索地被许多人的行为和信仰带走时，那些有思想的人发现自己暴露了，因为他们拒绝与他人联合是一种专利，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 汉娜·阿伦特《道德考量》

1. 幻想党是矛盾在历史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在这个时期，支配权作为可见性的独裁，作为可见性的独裁，总之是作为景观。因为起初只有消极性的一方，而且因为无法清算这一点，景观的巫术包括使消极性的表达不可见-这对行动的自由和痛苦或污染也是如此-它最显著的特征正是被誉为不存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想象的。然而，人们正是在不停地谈论这一点，而且只谈论这一点，因为正是它每天都在使社会正常运作的失败变得更加明显。但人们不愿意说出它的名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出它的名字-因为人们担心会唤起魔鬼。在这一点上，人们做得很好：在一个如此明显地成为精神属性的世界中，发音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即成为表演性的。反过来说，即使在这里，幻想党的名义上的唤起与它的构成行为同样值得称赞。到现在为止，也就是说到它的命名为止，它不可能比认识自己是无产阶级之前的古典无产阶级更多：一个不是公民社会的阶级，而是公民社会的解体。实际上，它至今只是由那些没有阶级、也不想有阶级的人的消极人群组成，由那些在自愿不参与商品社会的形式下重新占有他们在商品社会中的基本不存在的人的孤独的人群组成。起初，”幻想党”只是把自己表现为叛变的群体、出走的党、逃离现实的党，自相矛盾地表现为没有主体的颠覆。但这并不是它的本质，就像黎明不是一天的本质一样。它的丰富性还没有到来，除非它与产生它的、而现在又拒绝它的东西有活生生的默契，否则不可能出现。”只有那些具有创造未来的天职和意愿的人，才能看到现在的具体真相”（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2. 虚构的一方是趋向于成为现实的一方，不断地。景观除了无情地阻碍它的表现，也就是阻碍它变得有意识，也就是阻碍它变得真实之外，没有其他的部属；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不得不承认这种消极性的存在，而它作为积极性的积极方，就是永久的去否定。因此，”景观”的本质是将反对派阵营视为可忽略的残余物，使其成为一个完全的虚无，而这就意味着，在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罪犯和怪物的痛苦下，宣布其完全是犯罪和非人。归根结底，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只有两个政党：一个是假装只有一个政党的政党，另一个是知道实际上有两个政党的政党。从这一观察中，人们就知道要认识我们的党。

3. 我们把战争简化为战斗的残酷冲击，这是不对的，除非有不难解释的理由。当然，如果把战争理解为它的真实面目，那才是真正有害于公共秩序的：这是一种最高的突发事件，它的准备和延期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所有的人类团体，而和平并不是最终的，只是一个瞬间。社会战争也是如此，它的战斗在发作时可以保持完全沉默，可以说是没有色彩的。人们只能从占主导地位的反常现象的突然复苏中推测出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认识到，与伤亡相比，战斗是夸张的罕见。

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了基本的公理，根据这个公理，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esse est percipi-景观维持了一个脆弱的民间和平的高昂和全球性的幻觉，其完美性要求我们让它在所有领域传播其巨大的社会安抚运动和社会矛盾的中立化。但是，它可以预见的失败在逻辑上体现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这场平定运动仍然是一场战争，当然是有史以来最可怕和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因为它是以和平的名义进行的。此外，”景观”最恒定的特征之一是它不谈战争，而是在一种语言中，”战争”一词的出现不超过”人道主义行动”、”国际制裁”、”维持秩序”、”保障人的权利”、打击”恐怖主义”、”教派”、”极端主义”或”恋童癖”的问题，以及在所有这些问题中的”和平进程”。敌人不再被称为敌人，但为了报复，他们被置于法律之外，被置于人类之外，因为他们破坏和扰乱了和平；每一场以维护或扩大经济或战略力量地位为目的的战争，都必须借助一种宣传，把它变成一场十字军东征或人

类的最后战争。景观所依赖的谎言要求它是这样的。这种无稽之谈除了显示出系统的连贯性和令人震惊的内部逻辑外，到目前为止，这个表面上非政治的、同时也是反政治的系统并没有帮助现有的敌对配置，也没有在朋友和敌人之间激起新的重组，因为它不知道如何摆脱政治的逻辑。不了解战争的人就不了解他们自己的时代。

5. 商品社会自诞生以来，从未放弃过对政治的绝对仇恨，而这正是它最大的苦恼所在，因为消除政治的计划本身就是政治。它非常想谈论法律、经济、文化、哲学、环境，甚至是政治，但从不谈论政治。这种否定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归化的形式，而这种归化的不可能性以一种同样不变的方式被周期性的危机所谴责。古典经济和与之相应的自由主义世纪（1815-1914）构成了这种归化的第一次尝试，也是第一次失败。功利学说、需求体系、市场”自然”自动调节的神话、人的权利的意识形态和议会民主，都是在这个时代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设置的手段。但无可争议的是，在1914年开启的历史时期，商品统治的自然化显示出其最激进的形式。生物权力。在生物权力中，逐渐自主化的社会整体开始对生活本身进行管理。一方面，它监督着生物学的政治化：健康、美丽、性欲，以及每个人每年的可用能量，更清楚地揭示了社会的管理责任。另一边，是政治的生物化运作：生态、经济、”福祉”和”关怀”的一般重新分配、人口的增长、寿命和老龄化强加给自己，作为人们衡量权力行使的主要章节。当然，这只是这个过程的表象，而不是过程本身。实际上，它所涉及的是依靠身体和生物生命的虚假证据，完全控制行为、表象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说，出于一种所谓的保护本能，迫使每个人都同意接受这个景观。因为它把自己的绝对主权建立在人类物种的动物学统一性和”生命”的生产和繁殖的内在连续性上，所以生物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杀人的暴政，以所有人和”自然”的名义对每个人行使自己的权力。所有对这个社会的敌意，无论是罪犯、异类还是政敌，都必须被清算，因为它违背了物种的利益，尤其是罪犯、异类和政敌的利益。正是这样，每一个新的指令都会稍微限制一些已经被贬低的自由，假装保护每个人免受自己的伤害，将其主权的奢侈性与赤裸裸的生命的最后比例相对立。”请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生物权力在拿出它的注射器时说。当然，赤裸裸的生命-人类生命不再

27. 幻想党不需要从现在的社会和它的演变中等待什么，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是，也就是说，它的解体和超越的事实存在。因此，对它来说，这不是一个夺取权力的问题，而仅仅是通过持久地使它的机器无法运作而使统治在任何地方失效的问题-在幻想党的旗帜下运作的竞争的临时性，甚至是逃亡的地方，都说明了这一点：它被保证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它所诉诸的暴力与”景观”的暴力性质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它在隐蔽处独自战斗。当商品统治释放出它的”空洞的自由”，它的”消极的意志，除了在毁灭中没有存在的感觉”（黑格尔），只要它的无意义的暴力只渴望虚无的无限延伸，幻想党的暴力的行使，尽管是无限的，但只与保护权力准备改变或已经威胁的生活形式有关。它的力量和无与伦比的光环由此而来，它的丰富性和它的绝对合法性也由此而来。即使在攻势中，它也是一种保护性的暴力。我们在这里重新发现了我们所说的不对称性。幻想的一方并不追求与统治相同的目的，如果它们同时存在，那就是它们中的每一方都想摧毁另一方试图实现的东西；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景观并不希望超过这一点。幻想党应该走到商品社会的尽头，而且这种胜利应该是不可逆转的，这将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为一种没有任何统治的生活赋予强度、伟大和实质，也取决于它的有意识的部分是否有能力在他们的实践和理论中明确这一点。令人担心的是，比起失败的可能性，统治者更愿意选择普遍的自杀，在那里它至少可以保证把它的对手也带上。从一端到另一端，这都是我们的赌注。判断我们所做的是否只是一个开始或已经是一个结束，是属于历史的。绝对是在历史中。

经允许幻想党的部分成员，强加他们的卓越。我们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无非是精神的地图。目前，正是这种精神的公共性，在所有方面都充斥着幻想党，其中的白痴和卑鄙每天都变得更加凶猛，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将不可避免地终结它。

26. 毋庸置疑，”景观”对幻想党和自由所进行的消耗战，从此摧毁了社会空间的整个区域。在那里，它颁布了只有在世界冲突中才会出现的保护措施：宵禁、军事护送、有条不紊地收集信息、控制武器和通信、托管整个经济部门等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直接迈向一种无法估量的恐惧。他们的噩梦中充满了折磨，而这些折磨不再只属于梦境的范畴。现在，人们谈到了海盗、怪物和巨人。与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的发展联系在一起，面部表情显示出一种致命的、持续积累的小型神经疲劳。当每个时代都在为下一个时代做准备的时候，小苏丹们突然出现，并在他们之间争夺一个已经缩小到流通空间的公共空间的控制权。最软弱的精神把自己交给疯狂的谣言，没有人能够证实或否认。无穷无尽的事物填补了人类彼此之间的距离。尽管越来越模糊，但每一天都会让人更清楚地看到内战的可怕轮廓，在那里，没有人知道谁在战斗，谁没有战斗，混乱只限于死亡；在那里，没有什么是可以保证的，但会有更糟糕的结果。因此，在所有增长的这一边，我们把自己放在灾难的证据中，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的目光投向远方。这样看来，这些都是”出生的痛苦”，任何新时代都无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那些目光敏锐的人在黑夜中分辨出附近巨人的战斗，发现所有这些荒凉，所有这些沉闷的大炮回声，所有这些不露面的尖叫声，其实都不是商品统治的孤独、狰狞的泰坦，它在血腥的谵妄中挣扎、嚎叫、燃烧和践踏；为了确保我们想要它的皮，它匆匆发出无意义的命令，在地上打滚，最后用它的全部重量敲打它客厅的墙壁。在其愚蠢的深渊中，它判断幻想党只是围绕着它的朦胧，而这必须被废除。听它说，它似乎已经受够了这块坚持不与地图吻合的错误领土，它已经用最严重的报复来威胁它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人再听它的话，它最亲近的臣民们对这个狂妄的老疯子也只是心不在焉的听着。他们表现得好像是在听，然后他们互相眨眼。

区别于动物生命的观点—一直是商品虚无主义考虑人类的观点。但目前是所有超越性的表现，其中政治是一种粉碎性的形式，所有自由的意图，所有形而上学本质的表达和人类的消极性都被当作一种弊病，为了共同的幸福，必须被压制。然而，对革命的嗜好—一种地方病，对它的永久接种运动尚未实现—当然可以解释为危险的遗传、过高的荷尔蒙水平和某种神经介质的不足的不愉快的巧合。在生物权力内部不可能有政治，而只能是反对生物权力。因为生物权力是对政治的否定，真正的政治必须从生物权力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要揭示它的本质。

6. 因此，在《生物权力》中，是身体的维度逃离了人类，面对他们而竖起了自己，并压迫着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生物权力》是景观的一个时刻，就像身体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时刻。因此，这是一种铁的必然性，它甚至从最小的细节显然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身体—就注定了目前的争论要把自己放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否则就会一无所有。因此，它既不能被包括在内，也不能类似地被感知到在”景观”或”生物权力”的内部，就像所有抛出幻想党的其他东西一样。就时间而言，它的主要属性是它在一种商品化的揭幕模式的核心中的事实上的不可见性，这种模式肯定是形而上学的，但事实上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且首先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本身。但是，”景观”厌恶真空，它不能让自己否认这些新类型的敌对行为的大量证据，这些敌对行为越来越激烈地激荡着社会主体；换句话说，它必须掩盖这一点。因此，它又回到了多种神秘的力量中去，发明了假的冲突，这些冲突总是更加空洞，总是更加虚构，而且本身总是更加暴力，以至于反政治。正是在这种沉重的恐怖平衡上，所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平静才得以维持。

7. 在这个意义上，幻想党是一个政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政治的政党，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指定绝对敌意的形而上学劳动的政党，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断裂的内在存在。通过这一点，它走上了绝对政治的道路。幻想党是政治在民族国家崩溃的时候所采取的形式，我们知道从今以后，民族国家是必死的。它戏剧性地唤起了任何一个不衰老的国家，或足够旺盛的国家，完全

断言政治空间在其现实中并不与物质、社会、文化等空间相区别；用其他术语和古老的表述，一切皆为政治，或至少对权力而言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政治倒是作为自由主义认为它可以逐个谓词分割的空间的全部出现。生物权力的时代是支配力开始应用于身体的时刻，直到个人的生理学具有政治性，尽管有生物自然性的可笑借口。因此，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全面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元素，其中包含了人类的所有自由。

8. 在这些阴郁的日子里，我们见证了商品社会分解的最后阶段，我们同意这个阶段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在地球层面上，我们看到商品的地图和人类的领土以更大的比例发生了分歧。这种景象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混乱，但这种“混乱”只表现为世界经济视野的不适应，它从未理解过人类的现实。显而易见，价值不再能衡量任何东西：会计变成了空洞。工作本身除了满足普遍的奴役需求外，没有其他目标，而金钱已经完成了，它让自己被它所宣传的虚无所吸引。同时，建立在抽象的等价交换和代表原则基础上的全部旧资产阶级机构已经进入了一种危机，它们似乎已经疲惫不堪，无法恢复过来：司法不再负责审判，教学不再负责教学，医学不再负责治疗，议会不再负责立法，警察不再负责强制尊重法律，家庭甚至也不负责抚养孩子。当然，古老建筑的外部形式仍然存在，但所有的生命已经明确地离开了它。它漂浮在一个总是更荒唐、更容易被察觉的非时间性中。为了欺骗世界关于日益严重的灾难，“景观”仍然不时地来到这里，展示游行的象征，但没有人理解它们了。它们的魔力除了魔术师之外，没有人着迷。因此，国民议会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纪念碑，除了游客的愚蠢的好奇心之外，没有其他的兴奋点。旧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荒凉的乡村，那里有新的废墟和死尸，它们等待着拆毁，但如果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它们可能会等待到永远。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庆祝活动，也从来没有过他们的热情显得更虚假、更微弱、更被迫。即使是最粗略的欢庆也不再具有某种悲伤的气氛。与表象相反，合奏的灭亡并不是一个又一个器官的灭亡；它的分解和腐蚀，对其他人来说，不是在一些可观察到的积极现象中，而是在被解开的普遍冷漠中；这种冷漠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没有人认为自己与此有关，也没有人决定以任何方式来补救它。正如”在所有事物崩溃的情绪面前，什么都不做，只是耐心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同时，在这一边，景观强加给公众的极端疏离，作为平衡，我们看到了曙光，但混杂着相反的原则，一种人性，其意义是唯一的滋养，尽管被腐蚀。从生产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从隐居的工作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脆弱的世界组成了自己，对它们来说，选择性的亲和力是全部，而奴役性的东西则不是。大都会的废墟上已经没有更多的活物，只有人类个体的流动聚集，他们找不到疏远的理由，就会从各个方向绕过它。人类在”景观”中的奴役，对他们来说并不亚于他们的自由对奴隶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奢侈。在他们存在的暂停中，世界的问题不再是问题，它已成为他们生活的材料。语言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种必须被内化才能应用于世界的费力的外部性，它已经成为那个世界的直接物质。在任何时候，他们的行动都不会与他们的语言分离开来。因此，人们理解，在政治和经济仍然是与形而上学相分离的抽象物的情况下，”景观”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事先的公共性形式。但事实上，在意义的实质性连续性中，所有旧的石化的二元论都被废除了。在这些丰富的意义的总体性中，充分和公开的，永恒在每个瞬间发现自己，整个宇宙在它的每个细节中。他们的世界，城市，作为一种内部性收容了他们，而他们的内部性已经具有了世界的尺寸。他们已经以一种局部的、暂时的、可悲的可逆的方式，在”恢复现实和超验的破碎统一”（卢卡奇）。但对于统治的任性来说，他们的生活将自己引向它所包含的所有人类潜能的实现。公众性的下一个数字对应于这一点的最大部署，也就是说，它拥护语言，没有丝毫的约束，它就是语言，就像它知道沉默。有了它，本质不再与外表区分开来，但人类已不再将这些与自身混淆。有了它，精神就有了它的休息，并在平静中关注着它自己的蜕变。语言是独特的法则，新的和永恒的，它超越了所有过去的法则，它当然是材料，但处于一种结晶状态。如果公共性的古老形式在或多或少的平衡结构中带来了自己，或多或少的和谐，那么这个形式恰恰是水平的、迷宫式的和拓扑式的。没有任何代表能在任何一点上超越它；它的所有空间都在宣传被探索。至于幻想党的运作衔接，就世界的支配而言，这不是由任何垂直委托的系统所保证的，而是在语言的无限水平性中刻下的一种传播方式本身：例子的方式。Tiqqun 世界的地理平面绝不意味着价值的废除和人类所有探索追求的结束。只是，它是通过”原型的权威而不是秩序的规范性”（Virno），允许人类，正如它已

都同意蹂躏市场的贬低性形而上学的专制主义，他们都加入了幻想党。但是，团结产生自身的运动也是差异构成和巩固自身的运动。在反对商品的空洞的普遍性的斗争中，每一个具体的群体都一点一点地认识到自己的特殊性，并提高自己对其特殊性的认识，也就是说，它通过普遍性扩散自己，并理解其反映。它把自己写进了精神的具体的普遍性中，从这里开始，在所有著名的人物中，出现了所有不可还原的人都陶醉其中的狂欢节。碎片接二连三地出现，共同点的再利用就这样开始了。以这种方式，在激烈的战斗中，社区的游牧芭蕾获得了一个形而上学种姓系统的复杂和建筑结构，其原则可能不是别的，而是游戏，也就是说，虚无的主权意识。每个形而上学的王国慢慢地了解了它在无限大陆上的领土的边界。同时，一个共同的一般性构成了自己，其中包含了所有不同的区域共性的总量，也就是说，它是对它们的修剪的追踪。可以预见，随着胜利的临近，幻想党的人将不再为打败一个至少已被削弱的敌人而打仗，以至于最后能够自由支配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分歧，他们完全打算通过游戏来耗尽这些分歧。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暴力的激烈倡导者，但却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暴力，高度仪式化并具有丰富的意义。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如果被欺骗就大错特错了，幻想党的胜利也同样是它的毁灭和瓦解。

25. 消除和预示幻想党的宣传形式与古典政治哲学中可以阐述的所有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要给它一个祖先的话，那就必须唤起人们对那些在罕见的、珍贵的叛乱时刻，在苏维埃、公社、1936-1937年的阿拉贡集体中，或在卡巴拉的秘密学校中，例如在萨菲德的秘密学校中，被偷偷摸摸地勾画出来的东西。每当这种最后的方式被强行推上历史的舞台时，其后果都是无限的。在那些生活在这一时刻的人中，很少有人能看到它—使所有被切断的和被限制的宣传形式支离破碎—后来甚至能忍受世界的景象，因为它离开了那些眼睛曾承受过 Tiqqun 的完整恢复的无与伦比的极光的人。但目前，由于进化的必然结果，就其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进展而言，人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除了平静中默默地安装自己的暴力断裂，并且在其持续时间内不被察觉，因为其前瞻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这个世界上，主导的存在形式知道他们已经被，根据概念，超越了，但仍然坚持存在，

地、盲目地等待充满裂缝、根部受到攻击的旧大厦的崩溃，让它被摇摇欲坠的脚手架摧毁，这既违背了智慧，也违背了尊严”（黑格尔），我们在某些不允许辨别壮观的揭幕方式的迹象中看到，为不可避免地流亡到”充满裂缝的旧大厦”之外做准备。已经出现了大量沉默和孤独的人，他们选择生活在商品世界的夹缝中，拒绝参与他们曾经有过的和睦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商品的魅力让他们顽固地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与商品形成的、现在正在崩溃的宇宙有关的一切都抱有莫名其妙的怀疑。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明显的故障，变得无法与它所强加给自己的社会融合，在它中间保证了必要的临时生存的不确定空间，自治区总是更广阔，总是更多，在那里为整个非壮观的世界勾勒一种精神，似乎在黄昏，但实际上是在黎明。一些生命形式的出现，其中的承诺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分解。在所有方面，这都类似于一种大规模的非合法性和秘密性的体验。有些时候，人已经活得好像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些时候，作为对这一不祥之兆的确认，我们看到一个知道自己将要死亡的世界的绝望的紧张和收缩。当共和国的时代已经过去的时候，人们却在谈论共和国的改革。当旗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还在谈论旗帜的颜色。这就是向那些敢于从其否定的角度，即从幻想党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时代的人所展示的宏伟而又致命的景象。

9.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必须是一个极端暴力和大混乱的时期。永久和普遍的例外状态是商品社会能够维持自身的唯一方式，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对可能的具体条件的破坏，使自己持久地处于虚无主义之中。当然，统治仍然有力量—物理力量以及象征性力量—但它并没有更多的力量。在批判它的话语的同时，这个社会也失去了它的理由的话语。它在一个深渊面前发现了自己，它发现这个深渊就是它的核心。正是这个随处可见的真相，它在所有的对话中不停地篡改”奉承的语言”，在那里，”精神与自己和对自我的对话内容是对所有概念和所有现实的歪曲，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普遍嘲弄，而阐述这种嘲弄的厚颜无耻对它来说是最高真相”，在那里”对真和善的简单意识…对这种不知道它们也不说它们的精神无话可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的意识最终要求解散这整个变态的世界，它就不能一下子要求个人拒绝这个世界，因为第欧根尼本人在他的木桶里就受制于这个世界；此外，对单一的个人提出

的这种要求恰恰是错误的，因为错误在于在如此单一的情况下担心自己……这种解散的要求只能针对这种相同的文化精神。”人们在这里认识到了对语言的真实描述，从此以后，统治者以其最先进的形式说话，当它对消费社会、景观和他们的痛苦的批判纳入其话语。在法国，” Culture Canal+” 和” Inrockuptibles ” 都是些过眼云烟的重要例子。更普遍的是现代愤世嫉俗者的闪烁和复杂的语言，他已经确定了自由的所有用法，即接受一切的抽象自由，但以他自己的方式。在他欢快的孤独中，他的世界的尖锐意识为自己完全无力改变它而自豪。它发现自己也同样以一种狂热的方式被调动起来，反对自我意识，反对所有对实体性的追求。这样一个世界” 知道一切都与它疏远了，知道为自身而存在与为自身而存在相分离，或者说，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与真理相分离”（黑格尔），换句话说，它在有效地进行统治时，附庸风雅地公开知道它的统治是虚妄的、荒谬的和非法的，呼吁反对它，作为对它所说的那些被它残害了一切权利的人的暴力的唯一回应，从敌对中汲取他们的权利。人们不能再无辜地统治了。

10. 在这个阶段，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可避免地被逃脱的统治变得疯狂，并假装它不再有手段的暴政。生物权力和景观，作为互补的时刻，对应于商品反常的最终激进化，这似乎是它的胜利，也是它的损失的前奏。在一个和另一个案例中，它是一个从现实中消除所有超出其表现的问题。最后，一种无拘无束的任性附着在这个破败的大厦上，它试图毫不拖延地暴虐和削弱所有敢于在它之外给予自己独立存在的东西。我们就在那里。在这一点上，景观社会已经变得不可救药：它必须参与其存在的集体犯罪，没有人必须能够声称居住在它之外。它不能再容忍虚构党这个巨大的弃权方的存在。它必须工作，也就是说，必须随时准备接受它的支配，必须可以动员。为了达到目的，它同样使用最粗俗的手段，如饥饿的威胁，和最隐蔽的手段，如年轻妇女。褪色的” 公民权” 的老调子到处流传，涉及到一切，也涉及到一切，表达了这种参与社会整体的抽象义务的专制，而这种社会整体在所有方面都是自主的。正是以这种方式，甚至以这种独裁的事实，消极性的一方一点一点地统一起来，并获得积极的内容。因为漠不关心的人群中那些相互忽视、不认为自己属于任何一方的人，发现自己同样暴露在这种独特的、集

复其时间性的借口的条件被创造出来；自从 17 世纪的米勒主义起义和救世主式的犹太运动以来，我们已经失去的可能性被打开。无论人们怎么说，对一种新的力量和语言的尖锐要求都会感到自己被照亮，远远超出了目前的苦难。而分解的力量正是害怕这一点，他们向那些同意放弃自己以便被人喜欢的人许诺了那么多过分的好处。想象中的党起初只是指定了这样一个积极的事实，即这种完全独立于商品统治的众多区域的实验 hic et nunc，以及被异化的共同点的不断消失，一个社会有机体在灭亡过程中的最后抽搐，以及公共性的适当形式。直到现在，除了知识化之外，还从来没有过联合。在第一种情况下，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被动的特性：这些社区中，生命的意义和形式主导着生命本身，在那里，存在的责任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因此，他们共享相同的形而上的物质，但他们还不知道。只有在商品的全球统治所带来的共同迫害的黑暗主持下，才会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幻想党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东西：这些群体对普遍化的核算的抵抗，明确地将他们指定为统治者的抽象的蒸汽压路机。但最终，这种压迫的唯一可识别的效果是，这些独立的宇宙一个接一个地被他们的敌人引导，离开他们的特殊性的直接性，通过这种直接性，他们在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了他们的普遍性特征。而正是在这个敌人无非是否定形而上学的长期劳动的地方，它们才意识到是什么把它们结合起来：不是对形而上学特殊性的肯定，而是对形而上学本身的肯定。这种联系，在不肯定是直接的情况下，并不是什么形式上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构造上的东西，而是所有自由之前的东西，而且是它的基础：对商品的虚无主义的绝对和具体的存在敌意。由此可见，与过去所有被称为” 党” 的东西相反，幻想党并不向一个普遍的意志靠拢，因为它已经分享了共同点，在这里与语言、与精神、与形而上学，或者再次与有限性的政治相识别—所有这些术语在这种情况下都成了唯一的不可描述的许多假名。说幻想党的凝聚力是一种形而上的秩序，并不意味着唤起任何其他东西，而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发现自己总是已经参与其中，并反对彻底否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这场日常战争。在这一点上，它的统一的必要性强加给它的所有元素，与它的自觉性相同：” 斗争是在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所有其他可能的世界之间进行的。” (Peguy, Notes conjointes)。所有那些喜欢真理但肯定不是同一真理的人，

处不在，但社会学却看不到它的存在。同样，等待社会学也是徒劳的，仿佛它能给幻想党的有效存在提供任何指示，对它来说，幻想党的本质是外星的。就在那里，顺便说一下，这不过是社会学死亡的一个方面，它已经明确地超越了这种社会的社会化，它同样带走了社会学的社会化。在这种试验中，它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发现自己被它的小白鼠们自己嘲笑为独立的科学，同时他们也被迫成为他们自己的社会学家。以这种方式，自从那个核心的、独特的、无差别的例子以来，”景观”已经负责继续分泌所有的社会代码，而从韦伯到布尔迪厄的社会科学只保存和分享他们的谎言的重量。随着社会学的死亡，建立在社会学之上并作为社会学的古典社会批判彻底失败了，在崩溃的时候，它暴露了其背信弃义和奴性的本质。这种批判不再是在时代的层面上，它既不适合描述也不适合争论。这个任务从此回到了形而上学的批评。

24. 到这里为止，人们已经非常糟糕地把主导秩序的朋友和敌人共享的前线想象成了一条连续的线。对于这种表述，人们必须用循环的和无数的前线的形象来代替，其中每条前线在其内部时空中都有绝对不服从商品统治的人类社区、习俗和语言，而后者则根据其内在逻辑，毫不留情地围攻这些社区。所有有助于维持古老表象的东西都属于敌人的阵营。这场斗争的新几何学的第一个后果涉及颠覆的传播形式。面对一个专制商品的世界，我们不再是以穷人、工人或地球上的可怜人为对象，一个公司接一个公司地直线前进，而是以一种类似于水银滴表面上的同心圆被触碰时的连续传染。在这里，像过去一样的质量效应是通过在崩溃的时刻所生活的强度来达到的，这一点是相同的。由此可见，基本的革命主体不再是一个阶级或个人，而是形而上的共同体，无论它的流亡程度如何——这就是默认的证据，在景观中，所有个人的冒险，所有私人的历史，从根本上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不重要的。好的调查员不会夸张地判断，将世界缩减为微小而分散的中心，因为所有不是它们的东西，所有不给生命以特殊的、共同的存在内容的东西，在无生命的外表魅力背后都是死的。这些形而上学的社区中的每一个都觉醒于一个严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类除了在本质的基础上，再也不能见面，并在沙漠中构成一个独占的实体性的极点。所有不具备自身规律的知识，所有简单的表面性都被排除在其中。在那里，绝对性可以恢

中的独裁统治之下，即”景观”的独裁统治，其中工薪阶层、商品、虚无主义和可见性的要求都只是部分方面。因此，正是统治本身强加给他们，强加给那些本来满足于漂浮存在的志愿者，让他们承认自己的身份：反叛者。”当代的敌人并没有停止模仿法老的军队：他们追捕逃亡者，逃亡者，但从来没有达到超越他们或与他们对抗的目的”（保罗·维尔诺，《奇迹，技艺和似曾相识》）。在这种出走的过程中，一些前所未有的团结构成了自己，朋友和兄弟在他们指定的新战线后面重新组合，而”景观”和”幻想党”之间的正式对立变得具体。因此，在那些注意到自己本质上的边缘性的人中，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即非归属感，一种流亡的社区。在这个世界上，简单的疏离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蜕变为与疏离感的亲密关系。逃亡不过是一个事实，成为一种策略。现在，”逃离，说的是第三十六计，是最高政治”。但因此，幻想党已经不仅仅是幻想的了；它开始知道自己是虚构的，并缓慢地走向它的实现，这是它的毁灭。对这个社会的形而上学的敌意从现在起就不再是以纯粹的消极方式生活，就像对所有可能出现在它身上的东西的随意漠视，拒绝游戏，或者通过拒绝统治而被迫失败。它采取了一种积极的特征，通过这种方式，权力是如此完美地令人担忧，在它的偏执中，看到恐怖分子无处不在，这并没有错。这是一种冷酷无情的仇恨，就像炎症一样，在这个时候并不公开或在理论上表达自己，而是通过对所有社会设备的实际瘫痪，通过沉默和顽固的恶意，以及通过破坏所有创新、所有运动和所有智慧。哪儿都有危机，只有幻想党无所不在，它的中心无处不在，周遭无处不在，因为它与”景观”在同一领域运作。

11. 因此，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失败都必须被积极地理解，作为幻想党的工作，作为否定的工作，也就是人类的工作：在这样的战争中，所有否认一方的人，主观上都会做，但客观上都会团结在另一方。时代的激进主义施加了它的条件。只要有”景观”存在，幻想党的概念就会使敌对的新格局显现出来。幻想党要求那些在思想、语言或行为上阴谋破坏现有秩序的人的整体。灾难就是它的工作。

12. 直到某一点，幻想党对应于一个幽灵，对应于一个无形的存在，对应于在一个所有其他性都被压制的社会中他者的幻想性回

归，对应于对所有被概括的东西的单独交代。但是，这个噩梦，这个从”景观”的头顶上经过的自杀的想法，不能拖延—就目前社会生产的特征而言，它本身是幻想的—把它的现实作为意识变成实践，作为立即的实践意识而产生。幻想党是权力动摇的可耻病症的另一个名字：偏执狂，卡内蒂把它模糊地定义为”力量的弊病”。对公共空间的控制总是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的技术的绝望和全球性的部署，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了受伤的统治的疯人院的疯狂，它仍然在追求泰坦的旧梦，以建立一个普遍的国家；当它不过是其他人中的一个侏儒，并对此感到不安。在这个终结阶段，它只谈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为、极端主义和犯罪行为，因为宪法禁止它明确提及幻想党的存在。此外，这对它来说，在战斗中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不能指定它的狂热者去仇恨”激发无限勇气的真正的敌人”（卡夫卡）。

13. 然而有必要知道，就历史发展的方向而言，这种偏执狂并不缺乏理由。一个事实是，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化进程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破坏行为都构成了恐怖主义行为，也就是说，它客观上是针对整个社会的。因此，在自杀的极端中，它表现为一种死亡和自由相融合的姿态，它限定、暂停和取消了生物权力的主权—并由此获得了对统治的直接减损的意义—从而看到自己是一种强大的完成、生产和再生产其世界的力量。同样，当法律只依靠它的颁布，也就是依靠武力和任性，当它进入一个自主扩散的阶段，并且在这一切之上，当它不再包含任何精神气质时，那么所有的犯罪都必须被理解为对一个牢固的毁坏的社会秩序的全面竞争。所有的谋杀不再是对一个特定的人的谋杀—如果”特定的人”这种东西仍然可能的话—而是纯粹的谋杀，没有对象或主体，没有罪魁祸首或受害者。它立即成为一种反对法律的企图，而法律并不存在，但却希望在任何地方统治。从现在开始，最微小的违规行为都改变了它们的意义。所有的犯罪都变成了政治犯罪，而正是这一点，统治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之变得神秘，使一个时代的一切都蒙上面纱，而政治暴力，这具活生生的尸体，来要求人们对所有不知道它的形式进行清算。正是在这种方式下，《景观》可以有一种直觉，当幻想党表现出来时，它被某种盲目的恐怖主义的特征所护送。当然，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所有发达商品社会对它们在”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宣

话。在目前的条件下，它只能是众人的非党，因为正如可鄙的霍布斯所言，”当公民反叛国家时，他们就是众人反叛人民”。

22. 如果”幻想党”的概念首先命名了暂停的时代中的消极性，同时也命名了这种消极性的不可见性，那么就有必要将其与这个概念不可分割地理解，这个概念让自己害怕所有实践的积极内容，而”景观”只能把握其消极内容，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这样的。正如它所限定的”政治危机”是对卑鄙的、既定的政治空间的大规模偏离，”文化危机”是对一季又一季的现代艺术所阐述的所有令人震惊的浪费的顽固冷漠，”教育危机”是对学术禁锢的日益拒绝。经济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无声抵制和对工作的一贯拒绝，”家庭危机”是对不健康的核心家庭的坚决抨击，”社会关系危机”无非是对异化的社会关系和壮观的习俗的拒绝，它在这场”无声的革命”面前仍然是盲目的。在这场”无声的革命”面前，它仍然视而不见，因为它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的，我们的同代人最没有能力观察到的，而且用语言描绘和想象一样困难”。它忽视了”时代的精神，为它将要采取的新形式而慢慢地、悄悄地成熟起来，把它以前世界的结构的一个又一个碎片瓦解掉。它正在蹒跚地走向堕落，这一点只由这里和那里的症状所表明。在事物的既定秩序中蔓延开来的轻浮和焦虑，以及对未知事物的不确定预感—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有别的东西正在接近。这种逐渐破碎的现象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的总体面貌，但却被日出打断了，它在一瞬间一举将新世界的形式和结构展现在人们面前”（黑格尔）。蛇在脱皮的同时，确实仍然是盲目的。

23. 幻想党的所有积极性都是在不可代表的巨大盲点中进行的，而景观是无法单独瞥见的；这是因为幻想党在其所有方面都只是积极性的政治后果，而形而上学批判是其概念，布鲁姆是其代表。当布鲁姆，这个除了消极性之外不被任何社会决定所管理的生物，以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点太快地将其与大众相提并论，认为”孤立和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是其主要特征时，商品社会发现，它对它已经完全形成的主体性不再有任何控制，而且它在遵循其适当的路线时，也因此产生了其适当的否定。社会学领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显示了为统治而制造的产品的失败：布鲁姆无

器和惩罚并不与任何政治镇压的情况相联系，它与它是什么，与它的敌人是什么，都是同质的。表明这一点的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幻想党在其原则中包含了对商品统治所赖以存在的一切的否定，这种否定在表现为话语之前就会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与过去的革命不同，即将到来的叛乱并不要求任何世俗的超越，除了许多急于为自己辩解的压迫政权的持续消失，这些政权最终被憎恨。在任何时候，它都不会假装从人民、舆论、教会、国家或工人阶级那里获得其合法性，即使是以一种削弱的形式。它把自己的事业建立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但它知道这种一无所有与存在是相同的。它的罪行证明了这种神奇的主权，这就证明它把自己铭刻在任何特定的超越中，居住在死亡中；相反，它把自己植根于超越本身，而且没有中间人。正是由于这一点，它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此后作为障碍的东西并不是对权利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提出异议，也不是对这个或那个法律提出异议，而是对所有法律之前的那个东西，即服从的义务提出异议。更糟糕的是，幻想党人在最彻底地违反所有现有规则的情况下发展，却从未有违反规则的情绪，而是以蔑视规则的方式行事。他们不反对自己的权利，而是废止它们。它渴望获得比所有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更高的正当性：它是没有法律的文本。因此，它重申了安息日学说的绝对丑闻，该学说确认“法律的完成就是它的违反”，并将其抛在后面。它本身就构成了，因为它是活生生地废除了分享、分割和分离的古代法律，是 Tiqqun 的一个废品。它以例外的状态回应例外的状态，从而使整个司法大厦回到了它可悲的不现实中。最后，它没有代表任何人，而且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过度，因为甚至拒绝代表的主体。从所有人类存在的基本不可复制性出发，它宣称自己是不可被代表的，是不可被代表的，但也是不可被代表的。在这一点上，它类似于语言的整体或世界的整体，它蔑视所有具体的等价物。这样一个幻想的政党，从它作为罗马幻想的起源开始，就使所有法律的纪念物变得臭名昭著，它使资本主义国家回到了罪犯协会的行列，只是比其他人更有影响，更有组织，更有力量。这并没有假定任何社会的混乱。1920 年代的芝加哥是以一种模范的方式进行管理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幻想党从根本上说也是反国家和反民众的。对它来说，没有什么比政治统一的想法更可恶的了，如果不是顺从的

泄性但虚幻的外表下所持有的否定的内部化的时刻，但它在那里却是最表面的一面。它也允许每个人通过证明以下的一般规则来减少不可解决的特性：“政治统一性不可能在 *res publica*，即公众的形式下存在，而公众每次发现自己被质疑时，它就会创造一个非公开性的空间，这是对这种公开性的有效否定。”因此，某些人认为“党”消失在阴影中，但却把阴影变成了一个战略空间，从那里发出攻击，摧毁了直到现在帝国表现出来的地方，拆除了官方公共生活的巨大背景，一个技术专家的智慧不知道如何组织”（卡尔-施密特，《游击队理论》），这当然并不罕见。实际上，这是一种持续的诱惑，在人们熟悉的游击队、内战、游击战的种类下，在没有确切战线或敌对行动宣言、没有停战或和平条约的冲突中，设想幻想党的积极存在。从这些方面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战争的问题，它的行为、它的暴力、它的罪行背后没有任何东西，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没有其他计划，只是想成为有意识的暴力，也就是说，意识到它的形而上学和政治特性。

14. 因为，由于它对世界的看法的先天畸变，以及战略上的考虑，“景观”不能说任何东西，不能看任何东西，也不能理解虚构党的任何东西，而幻想党的实质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后者闯入可见性的特殊形式是灾难的形式。灾难是揭示，但不能被揭示的东西。通过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灾难除了对景观而言并不存在，它是景观所有耐心的劳动的突然和不可改变的毁灭，它使一个世界通过，而这个世界只是它自己的世界观；除此之外，它还表明，它不能像所有已完成的東西一样，理解毁灭。在每一次“灾难”中，都是商品的揭幕方式发现自己被揭开并中止。它的特征在它飞向碎片的时候得到了证明。它所强制使用的全部类别，害怕一个爆炸的现实。利息、等价物、微积分、功用、工作和价值都被否定的不可转让性抛到了空中。因此，幻想党在《景观》中被称为混乱、危机和灾难的党。

15. 在灾难的真相与爆发状态成正比的情况下，幻想党的人就会不择手段地努力加速灾难的到来。通信轴线对他们来说是特殊的目标。他们知道“价值数十亿”的基础设施如何在一场大胆的政变中被摧毁。他们知道对方组织的战术弱点、阻力最小的地方和脆弱

的时刻。此外，他们还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行动地点，在最小的力量可以造成最大的损失的地方采取行动。最令人不安的是，当人们审问他们时，他们当然知道这一切，但却不知道他们知道这一切。因此，一个装瓶厂的匿名工人把氰化物”就这样”倒在一把罐子里，一个年轻人以”山的纯洁”的名义暗杀了一个游客，并在他的罪行上签名”Le MESSI”。另一个”没有明显的理由”在他的小资产阶级父亲的生日上炸掉了他的大脑，第三个人向他的学校同学的聪明的牛群开火，最后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向在公路上热闹的诱人的汽车投掷砖头，当他没有在停车场烧掉它们。在《景观》中，想象的聚会并不是作为人类的工作出现的，而是在安息日传统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奇怪行为。然而，这些行为本身并不相互关联，而是系统地被关押在例外的谜团中；人们不会有想法在这些表现中看到独特和类似的人类消极性，因为人们不知道消极性是什么；在底部，人们不再知道人类是什么，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所有这一切都在荒诞的登记册中脱颖而出，而且代价是：没有什么是不突出的。最重要的是，”景观”不希望看到有那么多的攻击是针对它和它的无耻的。因此，从壮观的角度来看，从公共解释的某种疏离的角度来看，幻想党被恢复成一个混乱的无偿的和孤立的犯罪行为的组合，作者对这些行为没有任何感觉，类似于定期出现的总是更加神秘的恐怖主义形式；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是一样的，产生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即人们在景观中什么都没有得到保护，一个晦涩的威胁压在商品社会的空洞秩序中。毋庸置疑，例外的状态变得普遍化。在一个阵营中，没有人可以再假装安全，就像在另一个阵营中一样。这是好的。目前我们知道，结局已近在眼前。”清醒的圣人本身就认识到了毁灭的必要性，认识到了悲剧性问题的必要性”（巴塔耶，《有罪》）

16. 幻想党的概念使之可读的敌对行动的有效配置基本上以不对称性为标志。目前，我们与两个阵营的争端无关，这两个阵营为征服同一个战利品而竞争，而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个战利品进行的。在这里，主角们在这样完全陌生的平面上移动，一个来自另一个，除了在非常罕见的交汇点上，他们不会相遇，而一切都要靠某种偶然的心血来潮。但这种陌生感本身是不对称的：因为对幻想的一方来说，景观是没有神秘感的，而对景观来说，幻想的一方必须

动；但不幸的是，这一次，没有更多的库拉克可以”作为一个阶级被清算”。因此，不赞同偏执狂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的多种抗议的背后有一个用黑色计划武装起来的单一意志：因为在一个偏执狂的世界里，偏执狂才是正确的。

20. 景观害怕在它的胸中藏着一个幻想党，即使事实上反过来产生了它自己—实际上，是幻想党在它的光环中容纳了景观—这种怀疑暴露出，虽然它把这些破坏行为定性为”无偿的”，但它并没有说出一切。显而易见的是，人们归咎于”疯子”、”野蛮人”、”不负责任的人”的一系列错误行为都以相邻的方式促进了一个独特的未成型的项目：商品统治的清算。在最后的例子中，它始终是一个客观上使其生活不可能的问题，从宣传不安、怀疑和不信任；在每个人的手段的适度措施中，尽可能多地制造伤害。没有什么能解释罪犯的系统性缺乏悔意，如果不是参与宏大的破坏工作的无声情绪。从所有的证据来看，这些人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是一个严厉的、历史的和超越的理由的代理人，宣传的是世界的毁灭—也就是说，完成它的虚无。幻想党的那些有意识的部分的唯一精炼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为世界的毁灭而工作，而是为一个世界的毁灭而工作。这种差异在时机到来时，可以为最合理的仇恨留下足够的空间。但这对幻想党本身没有影响，它必须保持精神的下一个形象。

21. 幻想党的人是不规则地战斗。他们参与了这场西班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壮观的占领者因驻扎军队和物资而遭到破坏，在这场战争中，”非正规性的力量和重要性是由正规组织投入的力量和重要性决定的”（卡尔-施密特语），反之亦然，这是一场猖獗的辩证阵痛。幻想党可以依靠这个常数：一小撮游击队员就足以使所有的”秩序党”动弹不得。在这场当代人弃之不顾的战争中，没有任何战法可言。敌意是绝对的。秩序之党”本身并不愿意从一个时代回顾到另一个时代：只要有游击队的地方，它就必须作为游击队行动—只要知道监狱在过去十年里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不同的警察部队在同一时间养成了处理”边缘人”的习惯，就能理解这样一个关键词可能意味着血腥的任性。因此，只要商品统治还在，幻想党人就必须期望从它那里得到考虑，被当作罪犯来处理，或者被当作鹌鹑来射杀，视情况而定。它对他们挥舞的不相称的武

19.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围困它的屠杀、犯罪和灾难面前，在这无法解释的大量积累面前，“景观”不能再满足于注意到它对世界的看法中的差距的扩大。此外，它毫不回避地表达了“人们希望这种暴力是苦难的结果，是巨大贫困的结果。这将是更容易承认的”（Evenement du Jeudi, 1998年9月10日）。正如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迷人的规律，它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惜一切代价提出解释，因为它必须毁掉它在理论上可以依赖的所有东西。因此，当可怜的林顿被要求为基普兰-金克尔的美丽姿态提供理由并得出其后果时，他发现除了“电影和暴力电子游戏的新文化的影响”外，没有任何责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注意到了商品统治对主体的透明性、非实体性和根本性的清算，并公开承认，这种假装赖以生存的悲剧性 Robinsonnade，即个人的法学不可复制性，已经站不住脚了。他甚至巧妙地抽走了商品社会的本金，没有它，法律、私有财产、劳动力的买卖，以及直到现在还被称为“文化”的东西，读起来更像是文学幻想。它仍然宁愿牺牲它的伪正义的整个大厦，也不愿意穿透它的敌人的原因和性质。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就必须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周围环境的改造和人类活动的改造或人类自身的改造的重合，只能作为革命的实践来抓住和合理地理解”。然后，我们第二次回到了它目前试图抹去的这个忏悔；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它在荒唐的后记中穷尽了自己，论述了已经转向行动的布鲁姆的不存在的心理学。尽管有这些无休止的考虑，但它并没有达到为自己辩护的目的，因为审判中的情绪，从根本上说，就是它自己被审判，社会代替了被告的位置。太明显了，它的姿态的起源不是什么主观的，它只是在其圣洁性中，是统治的客观性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它同样从它的嘴里承认，它确实与一场社会战争有关，但没有说明是哪一场社会战争，也就是说，谁是主角。”这些疯狂行为的制造者，这些新的野蛮人，并不都是疯子。他们往往是非常普通的人”（Evenement du Jeudi, 1998年9月10日）。从现在开始，正是这种绝对敌意的最后修辞，它主持了对被宣布为野蛮人并被拒绝在人类之外的敌人的命名，它倾向于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强加给自己。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听到，在一个美好的社会和平时期，这样那样的公共交通大亨宣称“我们要重新征服领土”。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最经常被涂抹的形式下，到处都在传播着一个无法名状的内部敌人的存在，它在不断地进行破坏活

永远保持神秘感。由此产生了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后果：虽然我们可以毫无问题地指定我们的敌人，而我们的敌人在本质上是可以指定的，但我们的敌人却不能指定我们。幻想党没有统一性，因为统一性恰恰是景观的核心属性。因此，从现在开始，所有的统一性都必须感到自己受到威胁，而它所代表的所有货币也会受到威胁。换句话说，幻想党只知道它的敌人，而不知道它的成员，因为它的敌人正是所有人们可以知道的人。那些幻想党的人，在重新占有他们的“绽放（布鲁姆）”时，重新占有了他们被限制的匿名性。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反对景观强加给他们的处境，并把它作为一种不可战胜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让这个社会为从他们那里偷走他们的名字这一不可饶恕的罪行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主权的独特性的认识，以及对所有适当的人类生活的认识—将他们排除在所有可见性、所有社区、所有参与之外，将他们扔到人群中的区别中，扔到普通生活的虚无中，扔到人的神圣性被中止的大众中，并将意义的通道与他们的存在隔离开。正是从这种状态中，即“景观”想要维持他们的状态中，他们离开了。在这种恐怖主义中，无辜者受到的惩罚是“一无所有，没有命运，被一个匿名的系统剥夺了名字，他们因此成为这个系统最纯粹的化身”，这是完全不够的，同时也是某种智力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是今后全球化的抽象社会性的社会成品”。(Baudrillard)。因为，这些没有动机、没有指定受害者的谋杀案中的每一个，这些匿名的破坏行为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 Tiquun 的行为，执行了这个世界已经对自己宣判的判决。它使精神已经退出的东西归于虚无，使那些不是活着而是生存的人死亡，使长期以来只是废墟的东西毁灭。如果人们必须为这些行为接受“无偿”这个荒谬的修饰词，那是因为它们只是导致了那些已经是真实的、但仍然是神秘的东西的显现，导致了那些已经是真实的、但不为人所知的东西的实现。他们在灾难的过程中没有增加任何东西，他们记录和通知。

17. 它的敌人既没有面孔，也没有名字，更没有任何可以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尽管它有巨大的设计，但它总是在一个完美的布鲁姆的残骸下呈现出来，这就是适合释放权力的偏执狂。约翰-乔治-埃尔瑟 (Johann Georg Elser), 1939年11月8日在慕尼黑发生的炸弹袭击事件没有让希特勒幸免于难，他提供了一个模

型，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使商品统治陷入更加明智的惊恐。埃尔瑟是布卢姆的典范，如果这样的表达方式没有表达出一种残缺不全的矛盾的话。在他身上，一切都唤起了中立和虚无。他对世界的缺席是完全的，他的孤独是绝对的。他的平庸本身就是平庸的。精神的贫乏、个性的缺失和无足轻重是他唯一的属性，但它们从未变得显眼。当他讲述他作为一个杂工的生活时，是以一种没有底线的无个性的方式。没有什么能点燃他的激情。政治和意识形态让他同样无动于衷。他既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他却是1930年代德国的一名工人。当“法官”审问他为一项他花了一年时间精心准备的行为的动机时，他只提到增加对工人工资的扣减。他甚至宣称，他并不打算消灭国家社会主义，而只是想消灭他认为邪恶的几个人。正是这样一个人错过了将地球从一场世界大战和无与伦比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他的计划只依赖于他的孤独的决心，他的存在否定了这一点，他要蹂躏那些他是无法表达的敌人，那些代表邪恶霸权的东西。他只从自己身上获得了权利，也就是说，从他的决定的绝对粉碎性中获得了权利。秩序之党”将不得不面对，而且已经面对，这种基本的恐怖主义行为的增加，它无法理解，也无法预见，因为它们授权自己，除了形而上学的不可动摇的主权，以及每个人的存在都以无限小的剂量带入的疯狂的灾难可能性。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是荣耀，可以避开这种爆发，它以社会的恐怖主义为目标，对社会作出回应。它们的目标和世界一样广阔。因此，所有居住在“景观”中的人都必须永远生活在对毁灭威胁的恐惧中，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也没有人知道它与什么有关，人们只能勉强猜测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例子。在类似的辉煌行动中，缺乏可识别的目标必然是目标本身的一部分，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表现出一种外部性，一种陌生性，一种对商品揭幕方式的不可复制性，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腐蚀了它。这是一个传播不安的问题，这种不安使人类成为形而上学者，这种怀疑使对世界的主导性解释层层开裂。因此，“景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目标，如果它不是希望在整个机器中引发一个或多或少持久的故障，那也是徒劳的。没有什么比那些奇迹般的暂停更类似于废除管理异化世界的全部，在那里，所有被“景观”习惯性地掩盖的人性都粗暴地回归，分离的帝国被打败，嘴巴重新发现它们必须的话语，人类在对他们的同伴和对他们彼此之间不可区分的

需求方面获得重生。主宰有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从这些强烈的真相的单一时刻中完全恢复。但是，如果把幻想党的战略归结为对灾难的追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把想一鼓作气打垮谁也不知道哪个权力集中的地方的幼稚主义归功于我们，那就不会有任何误解。人们不会像攻击堡垒一样攻击揭幕方式，即使一个可以有效地导致另一个。因此，虚构党的目标并不是要对“景观”进行全面的叛乱，甚至也不是要直接和瞬间摧毁它。相反，它安排了一系列条件，使统治者尽可能快地和尽可能多地屈服于其偏执狂所谴责的渐进式瘫痪。尽管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但它的策略不是从正面进攻，而是在同一行动中隐藏自己，确定方向，加速疾病的爆发。”正是这一点让它不承认的权力持有者感到恐惧：不让自己被抓住，是对社会事实的消解，也是在自己身上重塑法律无法限制的主权的不安的固执”（布朗肖，《可耻的社区》）。面对这种危险的无处不在，统治者感到自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被背叛，越来越脆弱，除了将控制和怀疑扩大到一个领土的整体之外，别无选择，然而，自由流通是其重要原则。它可以用尽可能多的监护人包围它的“门控社区”，但地面会继续从它的脚下溜走。幻想党的本质就是到处瓜分商品社会，甚至在其信用基础上瓜分。除了它所破坏的东西的崩溃之外，它的解体做法没有其他限制。

19. 破坏血腥和平的帝国的，并不是幻想党的罪行内容，而是其形式。因为它们的形式是一种没有具体目标的敌意，是一种根本性的仇恨，它不尊重任何障碍，从一个最无法触及的内部，从人类与自己保持真正接触的未经改变的深处涌出。这就是为什么从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力量，而所有景观的喋喋不休都无法阻挡。日本的孩子，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幻想党中最强烈的先锋派，他们创造了一些词汇来指定这些绝对的愤怒，在那里，他们身上有一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事实上，有一些比他们更伟大的东西，占据着。最有名的公式是 mukatsuku；它的原意是“恶心”，也就是说，被最物理的形而上学的感觉所占据。在这种特殊的愤怒中，有一种神圣的东西。